

历史为媒、现实为基的大国“三农”论述

——评罗必良新著《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与模式选择》

钟甫宁

中华五千年孕育了璀璨的农业文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营制度与文化脉络。如果说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农业发展经历了从石油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型,那么蕴含于《四千年农夫》中的东方农业图景,无不向世人昭示着中国农业刻在基因里的天人合一理念。正是中国特殊的乡土文化促使着农业制度的革新与延续,并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提升农民风险应对力的作用,从而成就了我国用不足全球 9% 的土地养活世界近 1/5 人口的奇迹。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三农”迎来了新的发展局面,既有制度层面的革新,又有社会经济发展引致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再配置,还有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不仅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也达成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重要转型,并伴随着农民生产、生活的高质量发展,同时还在持续推动着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优化及共同富裕。这一巨幅画卷昭示着农业文明的璀璨,也是大国“三农”的底蕴所在。揭示其历史缘起、挖掘其理论逻辑、探索其发展路径是总结历史经验、坚定发展道路、创新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罗必良教授的新著《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与模式选择》正是立足于农业与国家形成的历史渊源,从中国古代农业制度的基因,推演新中国成立后“三农”发展逻辑,以及新时代“三农”改革方向,从而形成了“制度—行为—情景—变革”的总体研究思路,这对于理解农业的建构性基要及其演化逻辑具有重要价值。在我看来,本文至少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和价值:

一、将农业纳入国家建构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直以来,“三农”研究的焦点是政策研究、形势研究与微观主体行为研究。纵然关于中国农业史方面的研究并不鲜见,但大多是关于某种农作物或农业制度及经营方式的发展史,缺少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农业与国家形成的研究。在《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与模式选择》一书中,罗必良教授引入“谷物造就国家”和“双向驯化”两个重要研究话题,将农业与农村问题从微观层面或传统范畴上升到国家形成与社会发展层面,从而使得“三农”研究的意义得到升华。尽管这些研究内容引自国外重要学术期刊,但将这些内容嵌入大国“三农”的理论体系可以很好地实现农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从而破解学科间“隔行如隔山”“自说自话”的困局。据我所知,罗必良教授正在组织翻译和编辑《农业的制度经济学》系列读本,将国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关于农业与国家治理方面的相关成果编译成册,作为农业经济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选读教材,也可作为其他领域学生和学者了解农业经济学的窗口。我想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至少从加强学界对农业农村发展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理解以及揭示农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等方面来说,将农业纳入国家建构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强化农业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

二、探寻中国“三农”发展的文化与制度基因

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文化与制度是约束人类行为、决定要素配置的重要因素。中国“三

农”发展是在特殊的文化体系和制度框架下运行的,具有其特殊性和阶段性。《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与模式选择》一书全面分析了中国地权制度、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村庄治理文化、种植文化与制度信念,既有关于历史上“三农”制度的阐述,也有近期改革的相关内容,更多的是关于文化与制度基因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的文化体系决定了特殊的家庭结构与关系,而家庭作为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村落就是由这样一个个特殊的家庭所构成,既有立足于血缘关系的互助机制,又具备多重治理嵌套的特点。正是这样的村落与家庭文化背景以及特殊的人地关系,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地权分配制度和农耕文化。探寻中国“三农”发展的文化与制度基因的重要性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植于文化与制度,如果无视文化的特殊性与制度的延续性,那么很多改革,尤其是涉及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改革很难恰如其分地完成。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各地区的文化属性、制度特点都存在很大差异。在农村地区自古延续下来的一些文化遗产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是农村居民的主要行为规范。在这种情形下,阐明中国“三农”发展的文化与制度遗产,发掘其在决定农民行为、基层治理和农业经营中的作用,是理解中国“三农”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的重要前提。

三、在历史与现实情景转换中阐释中国“三农”发展之基要

《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与模式选择》一书的一大特点是在历史与现实的情景转换中阐释中国“三农”发展之基要。历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根植于历史传统的“三农”发展在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呈现极具特色的中国样貌。罗必良教授从大国人口、大国迁徙、大国饭碗、大国村庄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生育文化、安土重迁、小农种粮的组织优势、城乡历史关系在决定农业发展、农村转型与农民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虽然当今中国“三农”的改革发展逐步走向现代化,与传统农耕社会相距甚远,但文化烙印、传统习俗、乡规民约不仅仍然影响着“三农”发展,甚至对于当前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强调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情境的转换,《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与模式选择》一书才能将中国“三农”发展之基要阐述清楚,从而在行为与机理上讲明白当前中国“三农”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历史总结,无法看清当前发展轨迹;缺乏现实关照,难以厘清历史文化脉络。大国“三农”的发展轨迹,是历史照进现实,还是现实继承历史并开拓创新的过程,更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特色及优势从而改造世界的过程。

四、根植于历史脉络发掘中国“三农”改革之路径

经济学的特点是既要解释世界,更要寻求改造世界的路径。在系统介绍了大国“三农”的历史缘起、文化脉络和现实关照之后,《大国三农:制度文化、行为机理与模式选择》一书还探索了中国“三农”发展的模式与选择,重点关注了中国农业经营方式、村庄治理模式、城乡关系重塑及共同富裕的实现。这些重要模式与选择并非独立事件,更不是专家学者拍脑袋想出来的。从本书的发现来看,它们是中国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的延续与传承。从大国小农的现实场景出发,立足于农业家庭经营的比较优势,“第三条道路”是中国农业经营的重要取向;基于传统乡村关系,推行自治、德治与法治结合,是村社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打破城乡历史分割格局、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促进城乡包容性发展,以要素平等交换为媒介,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发展思路无一不立足中国改革实践,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脉络,从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